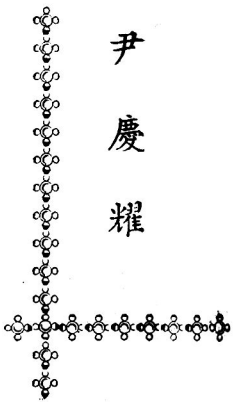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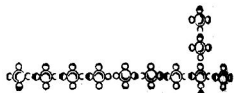


談「民族解放戰爭」

尹慶耀



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中，戴德華博士(Dr. George Taylor)華文姓名乃其自定)提出的論文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展望」。在討論期間，大家對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戰爭」的異同，發生了爭論。筆者發言，以為我們須要區別的是民族獨立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不同，而不是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戰爭」的差異。民族獨立戰爭是從民族立場出發，以民族獨立為最終目的，這是自由世界的觀念，大家都耳熟能詳。民族解放戰爭是從階級立場出發，它是打着民族主義的旗幟，以解放戰爭為第一階段，是一個過程，其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在民族解放戰爭地區，最初政權往往不在共黨之手，於是共黨一面高調反對帝國主義，一面指責政府與帝國主義勾結，而以「人民戰爭」形式，進行反帝同時反對政府的鬥爭。在反帝過程中奪取領導權，俟羽毛豐滿即顛覆政府奪取政權，以建立其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換言之，民族解放戰爭是共黨鬥爭策略、鬥爭方式之一，它經常以「人民戰爭」形式出之，把二者來加以區別，不僅困難而且無益。

由於發言時間限制，無法把它說得清楚。特借本刊一角的篇幅，對此一問題作一些補充的分析說明。

戴德華博士在論文中，引述了一項觀念說：民族解放戰爭最初是被作為點燃焚燬資本主義帝國在亞洲資源的火焰，進而癱瘓帝國主義的心臟——西歐的一個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工具。這項觀念是完全正確的。

列寧似乎是注意殖民地問題和東方潛在的「革命」力量的第一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較少提到殖民地問題，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觀念是：

東方從屬於西方。那似乎是說，西方的革命成功，東方的問題也就可迎刃而解。

但「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史達林語)。一九一六年春，列寧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至少從那時起他就已注意到殖民地問題。毛共理論雜誌「紅旗」一九七三年第九期闡述列寧此書的文章中說：「在帝國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都發展得更尖銳、更擴大了。」所謂民族解放戰爭，就是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加深世界帝國主義體制的危機而促其崩潰，那對於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有幫助的。

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革命成功後，列寧當然希望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繼續推展革命，但擺在眼前的更重要的急務，則是保衛稚弱的蘇維埃政權的生存。為此，他曾不顧黨內外的反對，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他當時的看法是，「國際方面的情況是非常嚴重、困難而危險的；必須隨機應變和退却；這是等待西歐革命重新爆發的時期」。「在能使我們擺脫一切困難的歐洲革命沒有爆發以前，我們一個有利機會，那就是國際帝國主義列強繼續在搏鬥……」①。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西歐的革命熱情也下火了，為了繼續推行世界革命，也為了繼續保衛蘇維埃政權，列寧更多地注意東方，注意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也是理所當然的。

人們不會忘記，列寧曾仿照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喊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的口號。毛共曾稱頌馬、恩的口號，「教育了全世界的無產者，促進了各國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聯合鬥爭」；又稱頌列寧的口號，「促進了西方各國的工人運動和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鬥爭。這是國際革命力量更加廣泛的聯合」②。

列寧這個口號，這項策略，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極為重要的，迄今仍為國際共黨所奉行。

二

一九二〇年七月開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就確定了把東方的民族解放鬥爭和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的策略。但當列寧在大會中提出他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草案時，也曾引起過爭論。印度代表羅易（M. N. Roy）認為，印度廣泛的革命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并無共同之處。他主張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發展純粹的共黨運動，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創立工農蘇維埃。

列寧認為「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③。他主張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應當支持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在國際大會中討論的結果，決定「把『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改為民族革命運動」。

粗粗看來，列寧關於共黨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主張，是頗為費解的。但如果細加分析，那也不難明白。

依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必須發展至成熟階段，內部矛盾已極端尖銳，無產階級革命才能爆發，社會主義社會才能代興。可是，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不易爆發，而列寧革命的園地——俄國，就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無產階級脆弱得不能夠擔當革命任務，那兒在（共黨的）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於是列寧主張共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應該參加乃至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不關心資產階級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為徹底完成革命而奮鬥」④。

在資產民主革命階段中壯大自己的力量，篡奪領導權，而後把革命「徹底」進行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就是列寧的階段革命論。早在一

九〇三年七月三十日，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列寧就支持普列漢諾夫（G. V. Plekhanov）提出由兩個部份構成的黨綱，最低限度綱領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最高限度綱領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兩個部分的黨綱，記載於一九三八年版的「聯共（布）黨史」上，成為日後國際共黨革命運動的圭臬。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裏，認定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⑤。又說：「誰人不知，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共產政權都經過一個人人民主階段，就是有本於此。

列寧這些主張，原本是一種策略運用⑦。列寧要求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的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在中國組織聯合戰線的宣言裏，有所謂「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裏，……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抗戰期間，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裏說：「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⑧。這篇文章原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這次全會確定了中共要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同時指出在統一戰線中有團結又有鬥爭。毛澤東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提法是不對的，他要求中共在統一戰線中，堅持它的「獨立自主」性。這些，就是列寧原則的具體運用。

可是，列寧為什麼定要把革命分為兩個階段，要自稱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去支持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呢？這主要是因為：（一）那裏的無產階級不夠壯大，沒有可能獨力進行革命；（二）共產主義思想不受歡迎，像羅易那樣主張加強宣傳共產主義，必將羣衆嚇得倒退。因此，列寧堅決「反對在落後國家內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⑨。那不能說是列寧反對共產主義啊！（三）列寧主張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而不混為一體，毛澤東所謂在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自主

「乃是使共黨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壯大自己，把羣衆引導上革命陣地而奪取領導權的一種必要過程。這是一種巧妙的策略運用，並且獲得過若干的成功。

三

在共黨形形色色的統一戰線中，民族統一戰線似乎是最成功的一種。因爲民族意識是最容易激動人心的。

我們該還記得，第二國際是被民族意識打垮的。雖然列寧大肆抨擊過第二國際各政黨「保護祖國」的口號，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進攻蘇聯時，史達林還是假借了「保衛祖國」的口號，才使得蘇聯免於滅亡，迄今蘇聯歷史學家，還在鼓吹那次「大祖國戰爭」的豐功偉績。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民族意識應該更爲強烈，那是完全可以瞭解的。在那裏，民族主義的旗幟，可以號召全民參加。因之，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討論過列寧和羅易的爭論後，把「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改爲「民族革命運動」，那麼，共黨支持、參加這種運動，是藉着民族主義的煙幕，掩護其共產主義的實體，就容易爲當地的人民接受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民族主義政黨，本應是全民的政黨，但共黨根據本身的立場，把它們指爲資產階級的政黨。共黨認爲資產階級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當這項運動發展到足以威脅其本身利益時，它就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勾結，共同來壓制當地的革命運動。因此，列寧曾指示共產國際，「只有在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時候，在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才應當支持並且一定支持這種運動」⑩。史達林在談到共黨「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各被壓迫民族和依賴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時，跟着說：「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趨向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趨向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⑪。

但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運動，當然絕大多數都是會削弱帝國主義的。共黨主張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聯盟，就是從此一觀點出發。毛澤東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所謂世界革

命是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在此以後，世界革命就變成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他說：「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⑫。

民族解放運動只是共黨世界革命的同盟軍，是共黨階段革命的第一階段，共黨必須把它轉化、質變成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方能達其世界革命的目的。

這裏所謂質變，并不以共黨所稱資產階級二重性的轉變爲依據，那原是莫須有的說法。共黨的質變，由第一階段革命到第二階段革命的轉化，是以其本身實力的消長爲依歸。它在民族主義反帝口號下，參加革命，由成長到壯大，它就要指資產階級（那常是指當地政府及執政黨）動搖、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把資產階級（實係共黨的政敵）打成反革命，推向「反」的帝國主義一邊，由共黨獨攬革命的領導權，而進行它的社會主義革命了。如果對方實力強大，那就把它區別成大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等，加以分化、聯大打少，指責其主要敵人不反帝、不民主，來予以孤立打倒。

四

列寧以爲東方的民族和國家，是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和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因此他要求共產國際，「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地主，反大土地佔有制，反各種封建表現或封建殘餘的農民運動，極力使農民運動帶有最大的革命性，並實現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及一般落後國家內農民革命運動間的儘量緊密的聯盟」⑬。

共黨重視的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階級，普列漢諾夫說過：「農民雖然人數衆多，但它是與最落後的經濟形式，即與小生產相聯結，因而也就是沒有，並且也不能有遠大前途的勞動階級」⑭。布爾什維克是擁護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但這并不妨礙它對農民運動的利用。假如它能够利用資產階

級（共黨最終是要推翻這個階級的）於一時，那麼它爲什麼不能利用農民階級？共黨能把過去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一部分的民族問題，現今當作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來處理；那麼它爲什麼不能把過去當作資產階級的後備力量的農民，現今當作無產階級的後備力量、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來處理？在策略運用上，共黨確已作了權宜的處理，這在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裏，說得很清楚。因此，布爾什維克普列漢諾夫說：「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到，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能够而且應當引導農民前進，並且它只有與農民聯盟，才能戰勝沙皇的制度」^⑮。在俄國是如此，而在「主要的居民羣衆是農民」的落後國家，更應該如此。

在農業國家的中國，工人階級佔極少數，中共乾脆就以農民革命來僞裝自己。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⑯。又說：「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⑰。

共黨利用民族意識反帝，利用階級意識反封建。對共黨說來，後者的意義實較前者尤爲重要。共黨藉鬥爭地主來培養階級仇恨，以「土改分田」誘引農民，以「保產保鄉」裏脅懼怕地主報復的農民參軍。它的軍隊常常是不脫產的，端起槍來打仗，拿起鋤頭種田，農暇時加以訓練。就是那些半脫產的乃至正規軍隊，也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它無需鉅額的軍餉，就可以養得衆多的軍隊。軍民一體而不可分，作戰時自可配合一致。共黨也就可運用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戰術，以達其奪取政權的目的。這是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利用政治教育，使兵士們都有階級覺悟，「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⑱。

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戰爭，於民族革命之外，還有階級革命的任務；於打倒外敵之後，還有推翻政府的任務。雖然民族敵人往往正是政府所打倒的，而共黨所注意的只是奪取政權！

北越共黨的「宣訓」雜誌，在其一九六四年四月號上，摘要發表了北越「人民報」(Nhân Dân)總編輯黃松(Hoàng Tung)在「越南幹部學習越南勞動黨九中全會決議」會議上的講話，他實際上是在重述中共的理論。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實踐的豐富經驗使我們得出下列結論：一、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薄弱環節相繼取得勝利，在資本主義發展緩慢或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取得勝利，而還不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中心，革命很難爆發，……：顯然，革命不是首先在西歐和北美、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資本強固的環節的方面爆發，而是在薄弱的環節、在作爲世界資本主義的農村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爆發」^⑲。

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去推翻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不佔多數的地區去幹無產階級革命，對馬克思學說實屬一大諷刺。然而黃松所說，又確屬事實。迄今沒有一個共產政權，是出現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內。共黨却專在亞、非、拉丁美洲披起民族解放的外衣，依靠農民階級的力量，去幹經由民族民主革命，轉化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勾當。因爲，正如黃松所說：「在這裏，工人階級可以依靠巨大的同盟軍——農民。……：民族獨立問題和土地問題是這三大洲各民族最迫切的兩個問題」^⑳。

共黨關心的不是民族獨立，也不是土改分田。在共產政權統治的地區，是不容許民族主義存在，又反對土地私有的制的。它對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只是一時的利用。同樣，列寧主張要經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反對跳躍過資本主義階段，那不是理論教條化的固執，而是策略靈活性的表現。因爲，他明明說過，歐洲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㉑。

五

讓我們重回到戴德華博士的論文罷。

戴博士講述民族解放戰爭時，指出民族主義本身並不是目的，它只是一個取得新的排他性的政治結構的手段而已。他并列舉中共在中國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之後仍繼續叛亂爲例。這是頗富說服力，足以促使民族解放地區的若干民族主義黨派及早覺醒的。戴博士又指出，共黨在某些時期，可在國內和非共產的民族主義合作，在國際間也可以如此，即使某一國家的內戰不是共黨所領導，它也可以毫不猶豫地予以支援，而後由民族主義轉變爲共產主

義。這一點就很難為受援者所及時察覺和及早自拔了，這是共黨迄今還可以僥倖得逞一時的的原因之一。

戴博士指出，人們辯稱獨裁主義可使共產主義更富吸引力，並且較諸民主的更替更適合亞洲。但經驗告訴我們，這并不一定是事實。我們有很好的理由來接受湯普遜爵士（Sir Robert Thompson）的判斷：「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就是大多數人民喜歡和支持政府更替的形式，而不是對共產主義式的接收。」

對於此一問題，我們得表示一點意見。把某一國家的民主模式強加給另一國家，那是一種錯誤。迨至此一措施遭受挫折，就乾脆說共產主義較之民主主義更適於那另一國家或某一地區，那同樣是一種錯誤，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錯誤。然則，為什麼共產主義者又能在某一國家、某一地區猖獗一時呢？對於這一問題，戴德華博士自己提出了很好的答案。他說：「根據特林基（Roger Trinquier）研究阿爾及利亞及湯普遜對馬來亞及越南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是：假如我們儘可能的破壞及剷除共產黨的組織，則共產黨的叛亂可以被消滅。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沒有健全組織的優良主義，其價值有限；但是一個沒有良好主義的健全組織，可以生存甚至對外擴張」。這乃是一針見血之言，不幸的是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而主動地替共黨塗上農村改良派的色彩（如大陸淪陷前的中共），蒙起民族主義的偽裝（如北越共黨南方支部——越南人民革命黨操縱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這是為幻想主義所騙；至於在厭戰之餘，經由談判使共黨合法化，對於只有一塊招牌的共黨「政府」，對於原是叛亂武裝的共黨軍隊，都予以事實承認，這是為現實主義所欺。這些都是招致失敗的主要根源。試想，共黨以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為號召，我們也跟着指責外國干涉，抨擊當地政府不民主，豈不成為共黨的客觀贊助人？

戴德華博士在論文中還提出來另外一些問題，也是極端重要而值得研究的。

首先，毛共和蘇聯鬥爭的結果，使民族解放運動分裂為二，一派親北平，一派親莫斯科，兩派之間互相傾軋。依戴博士的說法，越南的情勢就是如此，結果使得越戰難以解決。我們也認為，一般人以為毛蘇衝突激烈，共黨所支持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會被削弱，其實那是不盡然的。假如毛蘇為了爭取

「解放」勢力而在援助方面互相競爭，或是各各支持一派在擴張實力方面互相競爭，豈不使得問題更加複雜而難於解決？儘管毛蘇彼此鬥爭，但它在逐漸侵蝕最後埋葬自由世界方面，却是一致的。而任何一方面獲得優勢，對自由世界都沒有好處。

以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現今已幾近絕跡。可是毛蘇又創造出一個新殖民主義的名詞，說什麼政治獨立是不夠的，還要求經濟獨立，而煽動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在經濟方面反帝反殖。我們得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先進工業國的經濟發展，并非靠對殖民地的剝削來支持，它們對其原先的殖民地、現已獨立的新興國家，往往在經濟、貿易上予以優惠待遇，而自由世界給予這些國家的經濟援助總額，也遠遠超過共產世界所給予的同樣援助。當然，先進國家的援外，不能說全部是「無私」的，也不能說全部收到良好效果。可是，誰又能說共產世界的援外是「無私」的？毛共指責蘇聯的援助是一種掠奪，但毛共的援外數額既少，而且「政治掛帥」。以世人熟知的毛共對坦桑尼亞的援助而言，它除已在軍事方面利用并圖控制坦桑尼亞外，在經濟方面，其貸款附有購買毛共貨物的條件，其價還條件還不如加拿大貸款來得優越^②。

外援對於第三世界未能充分發生效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當一位法國人口學家最先使用「第三世界（Tiers-Monde）」一詞時，其原意是指亞非拉丁美洲地區北起北緯三〇度，南迄南緯三〇度的主要部分，那裏差不多有九〇個國家。這位學者認為，此一地區內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與世界其他地區異其性質，它的開發展望，不能依據西歐的經驗去理解，為了儘可能表現其「無色」，應稱之為與東方世界及西方世界不同的「第三世界」。可是，正如戴德華博士所云，西方學者創造了一個促進個人所得及國民總生產額的模式，在這些模式中忽略人性與文化差異，把此一模式應用到第三世界，因此它們的價值有限。照前述法國學者的觀點看來，西方的經援政策，似乎忽略了「第三世界」的「第三」性格，因而收效不宏。當然，我們沒有說這項經援，完全沒有成功的所在。至於蘇聯的策略，是要求新興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經濟方面先脫離西方，而後政治方面也隨之脫離西方；或是經過議會道路，使左派勢力先獲取政權，而後施行社會主義制度。前者我們還找不出一個成功的先例，後者却已有了智利的前車之鑒。

毛共開給第三世界的經濟處方是「自力更生」，那像是一個只勸病人講求衛生而不給他有效藥品的江湖郎中。不過，當第三世界與先進國家間經濟差距日漸擴大時，毛共把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而後把世界用富貧、大小、強弱的二分法一分為二，它自己則聯合第三世界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作法，不能說完全無效。當先進國家正為能源匱乏之苦時，毛共則慫恿第三世界從事資源鬥爭，也還有其蠱惑作用，是不能不加注意的。毛共的弱點是在印巴戰爭中它背叛了孟加拉的民族解放運動，而當巴基斯坦陷入危機時它又袖手旁觀；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它對阿拉伯的支援，吼叫的次數太多，實際行動太少。這些都不會在第三世界增加它的聲望。它指責蘇聯支持反動政權，蘇聯指責它不同情業已垮台的阿葉德粉紅色政權，而支持智利新政府。就共黨立場言，毛共不見得有利。至於一方面鼓勵第三世界反對兩個超大，一方面自己與美國勾勾搭搭，當季辛吉第六次訪問中國大陸時，毛共派其「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親往巴基斯坦迎接，無論毛共如何解釋，都是不易自圓其說的。

以上各項論點，有些在戴德華博士的論文中業已提及，他把對第三世界的援助一事，也寫進論文中，或許是認為在那一方面，共黨正在從事另一方面式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們在前文中已經說明，無論是軍事性的民族解放戰爭，或是政治、經濟性的民族解放運動，共黨的出發點與歸着點，都不是為了它所支援的某一個民族，而是為了它自己的共產主義運動，這對先進國家沒有好處，對第三世界則祇會帶來災禍。

註①：「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一九六〇年中共「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二五三頁（「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二六六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

註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列寧口號見「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四一二頁。按此原係共產國際為東方民族提出的口號。

註③：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中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二一一頁。

註④：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全集」第

九卷，三六頁。

註⑤：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選」二卷，六五八頁。

註⑥：同右，六八〇頁。

註⑦：按國際共黨的鬥爭策略，大多源自列寧。

註⑧：「毛選」二卷，五一二頁。

註⑨：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本「列寧文選」兩卷本第二卷，八四二頁。

註⑩：同註③，二一一——二二二頁。

註⑪：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本「列寧主義問題」，七九——八〇頁。

註⑫：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全文載「毛選」二卷，六一五——六五〇頁。

註⑬：同註⑨。

註⑭：一九三八年版「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一九五三年中共「人民出版社」中文本，一七頁。

註⑮：同右，一九頁。

註⑯：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選」二卷，二〇〇頁。

註⑰：同註⑤，六八五頁。

註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選」一卷，八八頁。

註⑲：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北平大公報」譯文。

註⑳：同右。

註㉑：同註③，二二三——二二四頁。

註㉒：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央社渥太華專電，轉述「多倫多星報」駐達萊撒蘭港記者的報導。按毛共對坦無息貸款四億二千萬美元，五年之後分三十年償還。加拿大對坦貸款亦為無息，分五十年償還，并寬限十年。